

# 我和毛泽东的 一段曲折经历

WO HE MAO ZEDONG DE  
YIDUAN QUZHE JINGLI

肖瑜著



昆仑出版社

# 我和毛泽东的一段 曲折经历

(原名《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

萧瑜 著

陈重、张雯、金翊、梁燕 编译

昆仑出版社

## 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肖瑜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河北新城书刊商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7.44·字数150,000

1989年6月第1版·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ISBN 7—80040—150—2/I·132

定价：2.95元

## 编 者 的 话

这本书是萧瑜（即萧旭东、萧子昇）所写、关于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期的活动以及与他交往的一些旧事。

萧瑜的名字，对当代国内青年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名气远不如他的弟弟——著名诗人萧三那么响亮。但萧瑜于本世纪初叶，在学生阶层中却算个风头很健的人物。他比毛泽东同志晚八个月出生，同是长沙第一师范的高才生，却比毛要高出三届。他俩同是著名教育家杨昌济的得意门生。在1913—1918年之间，他们对当时军阀政府统治下的混乱局面、民不聊生的现状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意欲瓜分中国的咄咄逼人的气焰，怀有共同的忧虑和愤慨。两人开出的“药方”固有不同，但想疗救百孔千疮的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的愿望都是强烈的。两人都有出众的才华和智慧，各各有自己的抱负，他们对国事日非也曾有过彻夜长谈，共同发起过“新民学会”，（毛被选为干事，萧为总干事）；他们一同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为造就一代英才而奔忙；他俩还曾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以乞丐的身份出游近千里，历访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真正深入到当时的社会底层，广泛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物：上自县太爷、归隐林泉的翰林，中到店铺老板、自食其力的富裕农户、衙门捕快、文书师爷，下至贩夫走卒、医巫僧侣、引车卖浆者之流。在这一段时期，他与毛几乎日日同桌掬食，抵足而眠，成

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应该说，萧对毛的青年时期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由他撰写的这本《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原名为《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便是以他们在长沙第一师范同学时期的那一段生活为主，兼及他和毛以后的交往情况。书中披露了一些鲜为国内读者所了解的事件和情节，有生活琐事，也有轶闻趣谈，有严肃的思考，也有激烈的争辩。作为当事人，萧瑜拥有较多的第一手材料。即以“身无分文、出游千里”来说，毛泽东同志曾和斯诺谈到过这件事：

“……夏天，我步行游历湖南省，走过了五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陪伴着我。我们走经了这五县，没有用过一文钱。农民给我们吃，给我们地方睡觉，我们到任何地方都被很好地招待着、欢迎着。”（见《西行漫记》三联版第115页）只有寥寥数笔。萧瑜的胞弟萧三，在他写的《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中也谈到这件事，同样也是“语焉不详”。萧瑜是毛唯一的旅伴，他在本书里用了五万字的篇幅详谈了游历的经过：他们如何无钱乘渡船，过湘江，船到中流时怎样搪塞船主；饥肠辘辘时，如何乞讨数家还难得一饱；见县太爷时，如何受到门卫和门房的百般刁难与辱骂。在乞讨无门而又饥渴难奈时，如何先进饭店边吃边设法应付。在途中也曾受到过老朋友的盛情款待和许多好心人的慷慨相助，也有慧眼识英雄的姑娘看破了他们的行藏。有许多生动的情节和细节，过程详尽，感情也还真切。这些回忆材料自然算不得历史文献，一面之辞更谈不上是信史，但作为一种可供研究的素材资料仍是可贵的。正如本书英文译注者罗伯特·C·诺思先生所说：“学者们迟早要开始寻找一些其它的资料——随便什么资料，只要能帮助他们弄清人物的出生情况和多年前

的成长过程，有了这些资料，虽然常常不可靠，学者们就能尽力而为了。”

这本书所提供的资料中，也确有一些不准确的東西。比如在本书中，作者萧瑜经常和毛泽东讨论一些当时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这些争论都是可能存在的。问题在于对这些争论的描述，萧常把自己的观点详加阐述，话锋犀利，舌扫三军。而毛的答辩则往往显得软弱无力。以毛的学识、智慧、辩才和在家连老子也不怕的性格，以及以后的事实都证明了并非如此。萧经常表示对任何权力都深恶而痛绝，认为不论是军权、财权、政权都是罪恶之源，都应摈弃。在萧的笔下，毛则是个权力的虔诚崇拜者。事实却恰恰作了相反的证明。萧本人于1924年接受过北洋军阀政府的聘任，出任教育部第一秘书；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大杀革命党人之后，萧又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农矿部政务次长。萧对这种权力颇为津津乐道，并不以为是罪恶的源泉，而毛泽东于国共合作期间，曾在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如果他抛弃自己的信仰和真理，与反动派妥协，那是不愁没有高官厚禄的。但是他选择了革命，去从事前途未卜，充满艰辛危难的游击战争。究竟谁在争权夺利，谁在追求真理那是不言自明的。

萧对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决定走列宁的道路有许多责难。他认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不过是以一种新的科学的专制代替了旧的封建专制。他认为只有教育救国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即使等待一千年也比“过激党”的革命要强得多。在他的笔下，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无言以答。而实际上毛在这方面是有非常精当的研究和解释的。他于1920年给萧瑜的信中就一

再指出：用教育的方法，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无产阶级什么也没有，资产阶级不但有教育机关，而且有议会、政府、军队、警察、银行、工厂……毛的结论是：

“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是赞成毛泽东同志的看法的。他对苏联十月革命的评价是：“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完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故其为人，由革命观点看起来，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孙中山选集》第535页）。孙中山不止是赞扬苏联的十月革命，而且要国民党全党效法苏联的革命。他说：“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指国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见孙中山《致蒋介石手札》，《孙中山选集》第876页）。

1921年中共建党时，列宁是苏联最高领导，斯大林并未上台。当时苏联正在执行“新经济政策”，提倡发展经济，接受外援，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聘请国外技师，允许私人经营小企业，允许农民自由买卖余粮。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在当时，萧、毛的那场争论，孰是孰非，结论是很容易得出的。

此外，作者还说毛在十五、六岁时，读《三国演义》和《水浒》只能囫圇吞枣，勉强读懂。实际上，毛八岁入私塾，

读过孔子《家语》、《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到十三岁止，已读过五年古书，何至于十五岁才能勉强读懂三国？萧瑜在本书中说毛泽东没有读过多少古典文学，也从不潜心研究书本，这更是有点信口雌黄了。毛博览群书，读必深研而后止，这种精神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行军时随身挑夫要挑一箱书；建国后，他的床上一半放书一半睡觉，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了，萧瑜的那些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作者的这些失误，究其原委，恐怕不外乎这几点：一是作者与毛泽东早年的友谊虽然比较深，但彼此思想上却存在不少分歧。毛过去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以后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而萧瑜却坚持信奉无政府主义。这种分歧到1919年之后变得更加强烈了。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正的态度，拒绝我国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一切被日本夺去的权利的要求，使毛泽东得出了：中国向西方列强学习，拜西方为师，但老师总是打学生的结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了。而五·四运动对萧瑜的思想似乎并没有什么触动。到1921年时，他们思想上的分歧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终于导至分道扬镳。政治上的分歧，使无政府主义者的萧瑜，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的回忆与评价，要想完全客观公正而不带偏见，那是很难的。

第二，萧瑜撰写本书时，约在五十年代中期。时隔三、四十年再去回忆往事，加之作者长期客居海外，可供查阅的资料未必就手，因而对人物、事物的回叙上，出现遗忘和失误的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的。比如当年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陈书农、罗章龙、周世钊和萧三都清楚地记得“新民学会”



成立于1918年，地址在蔡和森家中。而萧瑜却说成立于1914年，地址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室里。他还把不是新民学会会员的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廖宜男等说成是新民学会会员，郑重地写到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森林聚会时，蔡和森如何把新会员周恩来、廖宜男介绍给大家；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李立三如何在会上开并不幽默的玩笑等等。有些明显的错处我们作了部份的修改订正，有些则只在《编者的话》里或在正文之后的括号内作了简单的说明。同时，译者并对一些冗长乏味的政治说教作了一些删节。

书中出现某些不准确、不可靠的叙述的第三个原因，恐怕与作者喜欢“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有关。这在作品的许多地方都能感觉到：杨昌济有三个得意门生，他排在第一位；学校展览“模范作文”，他的文章入选最多；在与毛结伴徒步行乞游历时，一切困难都由他来解决，毛只是个跟着他沾光的随从而已。他自诩才高八斗，但写文章用典时却并不严谨。为了夸张湖南出人才，夸张湖南人刚毅威武，他引用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湖南虽包含在古楚国之内，但楚的中心在湖北而不在湖南。楚的都城“郢”，是现在的湖北江陵，以后几次迁都，也从未迁移到湖南境内。他说屈原投身汨罗江，人民最初纪念他的仪式是“用竹叶包着饭团投进水里”。但史记上的注解却说“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东汉建武以后才作粽投水祭屈原。至于他杜撰的“若欲中国真灭亡，除非湖南人死光”这句话，也是过份夸大其词的。湖南人诚然有很多好的美德，但中国的存亡，责任系在全国人民身上，岂止是一个湖南省所能担当得起的。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作者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无处不在。他在许

多地方以毛作自己的反衬，恐怕也有一点个人恩怨的因素，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过：

“这个跟我一同旅行的萧瑜，后来成了易培基手下的一一个国民党官吏。他替萧瑜得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监守的职位。萧氏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有价值的宝物，在1934年拐款潜逃了。”

这件事恐怕也有两种可能，一是误传。当时毛在延安，他虽能得到广泛的信息，但毕竟没有作过具体核实，是真还是假，我们不敢断言；第二种可能则是实有其事。在萧瑜的经历中，自1927至1930年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以后又任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而1931年突然从政界引退，1933年结婚后便前往法国，1937年回香港，38年又去法国。自政界引退，当然不会没有重要原因；再说，毛的这一段话，已随《西行漫记》而流布于全世界。萧是在50年代初期撰写本书的，决不会没有读过《西行漫记》，尤其是对他荣誉攸关的那一段话，决不至视若无睹。但他在自己的书里对这件事未置一词以答辩，这对于非常爱惜羽毛的人来说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吧。

至于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是否邀请过萧瑜先生一道参加这个极端重要而又极秘密的会议，按一般情况推断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与会代表是经各共产主义小组推举出来的。公开的史料中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由于作品不是文献更不是信史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作者姑妄言之，读者也是姑妄之而已，结论可由专门家去改证。

本书中还有一个专写“杨度”的章节。我们觉得对杨度其人，要作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杨的前半生的确做了许多蠢

事和坏事。他鼓吹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以后又组织筹安会，帮助袁世凯窃国称帝，他是“十三太保”中的元凶，是历史的罪人。但杨的后半生却倾心革命。张作霖逮捕李大钊要处以绞刑，他不避嫌疑，挺身而出多方营救；陈炯明叛变时，杨度曾利用北洋军阀派系斗争的矛盾，阻止援助陈炯明的部队南下接应，帮助孙中山脱险。以后他舍家纾难，变卖自己的房产以接济烈士家属和支援革命，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29年，杨度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做地下工作。有人说他是投机，他说：“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萧瑜在本书中只写了杨的前半生，没有写他思想立场转变后，作为革命志士的后半生，这是不全面，也是不公正的。

本书英文原版的评注人诺思先生所写的评注，态度是严肃的。他的注解，往往不是针对一句话或一个词，而是着眼于这句话或这个词的一些历史背景材料，所以比较泛。这对于不熟悉当时历史的读者来说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他作的注解中所引用的材料，绝大多数是有文字或文献作依据的。但有一些议论和看法，却存在着明显的失实。例如在注①中说：1839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一直与世隔绝，中国人将他们的帝国看作世界唯一的秩序”。我国在汉朝时即已与西域诸国交通。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组织了三百人的探险队出使乌孙，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以后汉武帝又连年派使官到安息（伊朗），身毒（印度）奄蔡（在黑海附近）、条支（伊拉克附近）、黎轩（埃及），唐时更与日本互派使者及留学生，著名的唐僧玄奘到印度取经；元朝不但知道有欧洲诸国，还使用过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为客卿；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足迹曾到过三十三国，最远曾到达非洲东

部海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说中国在1839年以前一直与世隔绝是不对的。

同是这个注①，说“19世纪中期，中国必须面对外国势力的挑战——虽然看起来经济技术方面的入侵多一些，军事方面的少一些。因为西方人不是凭借武力，而是凭了筑路和浮动贷款来获得土地。最主要的是建设工作而不是军事远征。”这一段话是显然违背历史的。清朝在1839年前后的确是闭关锁国的，当时不存在什么筑路和浮动贷款等“建设工作”，西方列强恰恰是凭借武力，凭借坚甲利兵的军事远征来打开门户，获得大批赔款、开设商埠和取得各种特权的。从18世纪末期起英国就大量向中国输出鸦片，1838年一年就达四万余箱，这要比现在世界各地毒枭贩卖的毒品还要多。林则徐禁烟销毁鸦片之后，1840年英国便在美法两国的支持下发动侵略战争：占定海，犯大沽，陷虎门，炮击广州，以后又攻厦门，下定海、宁波，占吴淞、镇江，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十三款：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中国进出口税率由中英共同商定。以此为始，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都在刺刀下签订：中俄璦琿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列强对中国不但要求割地还要赔款，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原注解中居然还说列强对中国的军事入侵少一些，西方人不是凭借武力、军事远征，而是凭借建设工作获得（中国的土地）。这简直是闭着眼睛说话了。

当然，不论这本书以及书的注释有多少缺点和不足，但

对于了解本世纪初叶我国的社会情况，了解那个时期人们的思想动向，了解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的某些生活、思想片断，作为一家之言，一个不同的角度的反映，还是值得一读的。

在本书编译过程中，译编者对与主题无关的某些情节和论述作了必要的删节，对原书的章节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并把原书名《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改成现在的《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在此一并说明。

##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济世豪杰与绿林好汉辈出之地	1
毛泽东度过其童年时代的田园	4
曲折艰辛的求学经历	7
东山小学	11
相识在第一师范	15
我们的第一次争论	19
第一师范的“孔夫子”	22
嫁给毛泽东的杨开慧	26
我们共同的朋友蔡和森	28
杨 度	33
妙高峰上彻夜长谈	38
新民学会	43
暑 假	43
修业学校和楚怡学校	53
“叫化”生活	60
“乞丐”出发了	66
克服第一道难关——渡河	70
第二道难关——饥饿	74
何胡子的家	82
沟山之行	91

汾山上的寺院	97
去安化途中	102
县城中的困厄	110
行乞益阳城	115
沅江洪水	124
回到长沙	131
留学运动的兴起	135
勤工俭学运动	139
毛泽东留在北京	145
中国共产党在法国的萌芽	150
蒙达尼郊外的森林聚会	156
长沙长谈	160
一连串的问题	163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66
最后的联系	172
原编者的评论注释和对有关资料的引述	174
原编者提供的萧瑜简历及其与毛泽东交往的年表	220

## 济世豪杰与绿林好汉辈出之地

毛泽东和我都出生在湖南省，这是一块以造就济世豪杰和绿林好汉而名闻遐迹的风水宝地。有句俗话说，“若欲中国真灭亡，除非湖南人死光。”这句话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华人都广为流传。两千多年前，这个地方是个强盛的国家，国名叫“楚”。它与邻国“秦”一直势不两立。另一句从那时流传至今的俗语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湘”是湖南的别称，随着改朝换代，各省的名称时有变更。1864年，湘军打败了试图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军，一时名声大噪。

湖南省的北部镶嵌着八百里洞庭。密如蛛网的河渠沟通洞庭、长江。发源于西南部山区的湘、资、沅、澧四条大江并排着向东北流去，注入洞庭湖，把湖南省分割成几块。最大的河流叫湘江，湖南省又称为湘就是由此而来的。

现在的名字包括“湖”和“南”两个字。显而易见，这么命名是因为本省正好在洞庭湖的南边。湖南省位于华中地区，据1947年的官方统计，总人口为二千六百一十七万一千一百一十七人。全省共分七十七个县，省会长沙，总面积二十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平方公里。

这个地区多崇山峻岭，又有四条大河萦绕其间，因而景色雄奇、壮美，令人望而生畏。才华横溢的诗人屈原就是生于此。在名诗《离骚》中，他悲叹自己在同僚嫉贤妒能、楚



怀王轻信谗言的宫廷里的遭遇。当他治国的理想最终完全破灭时，便投身于汨罗江。中国人至今年纪念他投江的日子：阴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最初的纪念仪式是把用竹叶包着的饭团扔进水里，后来演变成吃粽子和赛龙船。

这些崇山峻岭除了激发诗人、画家的灵感外，从远古以来，它们也为各路土匪啸聚山林提供了好屏障。当地土匪确实人多势众，人们都说“群盗如毛”。的确，比起黄河流域那些直接受孔孟之道熏陶的地区，湖南接受文化和知识要晚一些。有趣的是，三千多年前主宰一方的“苗蛮”，他们乃是今天住在边远的山洞中而与世隔绝的那少数断发纹身在半开化状态下的部落的祖先。

湖南人，即便是人人称道的谦谦学者，都偏爱这句口头禅：“老子不怕邪！”湖南人以其坚韧刚毅闻名全国。

1911年8月19日，揭开了推翻满清王朝的序幕。革命在湖北爆发时势单力孤。但是不出半个月，九月一日，湖南人刺杀了总督和一些高级官员，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于是革命成为定势。

能装载三千至五千吨的上海货船可以在湘江航运。湖南经常向欧洲出口大宗商品。最主要的是猪肉和猪鬃。吃稻米谷糠长大的湖南猪，肉味鲜美，远近驰名。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辣椒辛辣至极。它们是人们每餐必备的食物，刚刚学步的小孩就开始吃辣椒了。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辛辣的食物象征了食者的那种生龙活虎、坚强有力的性格吧。作为这片英雄和绿林好汉辈出之地的后代，我和毛泽东在对这种食物习以为常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就什么辣的都不怕了。